

试析尼中建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王艳芬

(苏州科技大学 历史系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中国和尼泊尔于 1955 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过程却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非常突出。1947 年印度迈向独立的进程促使尼泊尔的拉纳政权试图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恢复邦交,但国民党的垮台终结了这一前景;新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西藏的解放令尼印两国心生恐惧,尼印双方的“特殊关系”以及印度的阻挠令尼中关系的恢复止步不前;当中印之间就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等问题签订协议后,尼泊尔在尼赫鲁的默许下最终得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关键词: 尼泊尔; 中国; 印度; 拉纳政府

中图分类号: K355.5; K35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6)06-0114-07

On Indian Influence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Nepal and China

WANG Yan - fen

(H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was established in 1955, but its process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and heavily influenced by India. India's coming independence in 1947 had impelled the Nepal's Rana government to re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under the KMT's ruling, this prospect was end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KMT. And Nepal and India's scare about the appearance of New China and its liberation of Tibet in particular, the 'special relations' between Nepal and India, and India's obstruction, all of them made the recovery of Nepal's relations with China come to a halt; After an agreement about trade and traffic in Tibe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as reached, under the Nehru's acquiescence, Nepal's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Nepal; China; India; Rana government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我国的外交事业蒸蒸日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助推我国大外交战略格局的形成,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关注。毫无疑问,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然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有些较为复杂,比如中国与尼泊尔的关系^①。尼泊尔虽是我国的友好近邻,但鉴于其地缘政治及其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尼中关系往往受制于中印和尼印关系。历史地看,

^①中尼关系源远流长,自 1792 年尼藏战争后,尼泊尔在清代中华帝国的朝贡体制下,曾经每隔五年定期派使团向清王朝朝贡,直到 1912 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封建王朝的覆亡而自然终止。但尼泊尔与西藏地区又因 1856 年战争和清廷的孱弱而存在条约关系,直至 1956 年正式废除为止。

尼中关系的发展常常要考虑有时甚至取决于印度的态度,尼中建交即属此例。从中印尼三边关系的角度看待尼中建交问题,在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中或多或少均有所涉及,但存在梳理不够系统或因立场不同而对史实认定有所偏颇等问题^①。在国内学界,杨公素先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中尼、中印谈判过程给予了较为细致的交代,但欠缺学理探究^②;穆阿妮的《中尼建交的历史及其意义》一文涉及中尼建交的历史与意义两个主题,弱化了对中印尼三角关系的互动研究,且论据主要是中文文献^③。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较为权威的文献资料,聚焦印度在尼中建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印度独立之际拉纳政权对尼中建交的试探

尼泊尔的拉纳(Rana)政权自1846年建立直到1951年终结,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这个军事独裁的家族政权得以建立和存续全赖英印殖民帝国的支持和保护。英属东印度公司自17世纪初进入南亚次大陆,经过两百年的经营,最终将印度广袤的地域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19世纪初,英国人意欲经尼泊尔打通进入西藏和中国内陆的商业通道,结果导致了英尼之间的战争,战败的尼泊尔签署了《萨高利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尼泊尔无奈地割让了土地、接纳了英国驻扎官,但廓尔喀武士们多愤愤不平,反英情绪浓厚,时任尼泊尔政府首相屡屡进行反英行动,寄望于收复失地、赶走英国人。英国驻加德满都的驻扎官受命在尼寻找和培养亲英势力。对英国的强大力量拥有清醒认识又野心勃勃的拉纳将军进入了英国人的视线,双方一拍即合。在英国人支持下,拉纳将军于1846年在尼泊尔宫廷发动政变,顺利成为政府首相,逐渐建立起拉纳家族世袭首相之职并垄断国内军、政和财政要职的家族独裁政权。在此期间,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英国人帮助镇压那些被拉纳政权驱逐而流亡印度的尼泊尔人,拉纳政权则全力追随英印殖民政权,为之提供急需的廓尔喀雇佣兵,双方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④。

所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尼泊尔在拉纳政权的统治下一直奉行依附于英帝国的一边倒政策,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态势。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不断发展,英国从印度撤离的速度令拉纳政权始料未及。1946年8月,当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领导的临时政府组建后,拉纳政府真切地意识到,他们可能不久就要与印度民选政府打交道了^⑤。1947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撤出印度的时间表将不迟于1948年6月。因此,指望英国人继续留在印度为尼泊尔提供外部支持已无可能^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拉纳政府不得不决定扩大其国际交往范围,而首先映入眼帘的国家自然

包括拥有悠久历史联系的近邻——中国。1947年4月,拉纳首相向中国派出友好代表团或曰亲善使团。尽管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从未公开过,但可以较有把握地说,这一行动的意图就是试探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⑦。如同以往中国使者出访一样^⑧,尼泊尔代表团也带来了大量的礼物。《纽约时报》5月14日报道说,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克里希纳·苏姆谢尔(Krishna Shamsher)将军除了交给蒋介石一封拉纳首相的亲笔信外,还带来了送给蒋介石夫妇的67箱礼物,其中包括虎皮、豹皮、象牙、一把精美的宝剑和镶嵌了各种宝石的花瓶等。除了赠送各色

^①对该主题有所涉及或涉及较多的著作主要有:印度学者S. C. 巴特的《印度、尼泊尔和中国三边关系:条约关系研究》(S. C. Bhatt, *The Triangle India - Nepal - China: A Study of Treaty Relations*);拉玛坎特的《尼泊尔、中国与印度》(Ramakant, *Nepal - China and India*); M · D · 达拉姆萨尼主编的《尼泊尔外交政策》(M. D. Dharamdasani ed., *Nepal's Foreign Policy*)。尼泊尔学者维贾亚·库马尔·马南达尔的《尼泊尔与中国关系通史(至1955年)》第2卷(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美国学者雷欧·E. 罗斯的《尼泊尔:生存的战略》(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后面两位作者的著作大量利用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史料非常翔实。

^②中国前外交官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③穆阿妮《中尼建交的历史及其意义》,《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④有关拉纳家族政权的建立和英印殖民政府与拉纳政权的关系可分别参见拙作《试论拉纳家族政权的建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5—61页;《论英国在1950年代初尼泊尔革命中支持拉纳独裁体制的原因》,《安徽史学》2013年第3期,第62—67页。

^⑤Ramakant, *Nepal -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976, p. 67.

^⑥Rishikesh Shaha, *Modern Nepal: A Political History (1769—1955)*, Volume 2 (1885—1955),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1, p. 173.

^⑦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 New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2004, p. 74.

^⑧虽然尼泊尔的朝贡使团至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终止,但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曾于1930年、1932年、1934年和1946年四次派使团前往尼泊尔,向尼泊尔新任的拉纳首相及将军们授予宝鼎勋章或云麾勋章,并带去大量的礼品,以示友好。

礼品,尼泊尔代表团还向蒋介石夫妇分别赠予尼泊尔王室荣誉徽章以及三界^①最高一级勋章。作为回赠,蒋介石授予克里希纳·苏姆谢尔将军一等云麾勋章。据报道,蒋介石还曾安排自己的飞机将回程的克里希纳将军送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是尼泊尔代表团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华民国政府^②。

在双方会晤期间,克里希纳·苏姆谢尔表达了该国重建和促进与民国政府关系的愿望^③。英国驻尼泊尔大使 G. A. 法尔科纳(G. A. Falconer)给本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信也证实:在南京逗留期间,尼泊尔代表团与中国当局讨论了双方建交的可能性^④。

此时,拉纳政权向中国递出橄榄枝,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量:(1) 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来平衡与印度的关系。拉纳政权很清楚独立后的印度领袖对于尼泊尔封建政权的态度。印度的一些高层领导者比如副总理萨达尔·瓦拉巴依·帕特尔(Sardar Vallabhai Patel)等人一直把尼泊尔视为大印度的一部分。他们虽表现方式各异,但都倾向于认为,对于印度更广泛的利益而言,一个民主自由的尼泊尔政府比拉纳独裁统治要强得多^⑤。在新一代印度本土领袖对拉纳封建政权极为反感的压力之下,拉纳政府很可能认为,恢复与加强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有望获取援助和支持,以对抗民族主义的印度可能对其进行的侵蚀。所以,在拉纳政府看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甚至有可能成为比印度更可靠的朋友^⑥。(2) 试图借助中国打破孤立、走向世界。鉴于尼泊尔即将在印度建立大使馆,那么,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假如不与自古以来关系较为密切的近邻恢复外交关系,尼泊尔要把外交关系扩大到外部世界的意图就难以实现。另外,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事实不容忽视。为了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参与国际事务,尼泊尔也必须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然而,尼泊尔访华团并未带回希望之中的结果。有人认为,早期国民政府驻藏代表在拉萨被驱逐出去的经历有可能对尼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形成了某种阻碍。对拉纳政府而言,这次访华也只是一种试探,是向印度显示作为主权国家的一种姿态。不过,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深陷于内战,对于与尼泊尔建交一事既无心又无力。这应该是尼中关系未能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⑦。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在于,拉纳政府后来仍对尼中建交一事做出过努力。1948年4月,尼泊尔新任首相莫汉·苏姆谢尔(Mohan Shamsher)在就职演讲中就公开表明了其政府准备进一步拓展外交关系的意图,他特别提到了法国、荷兰、比利时和中国等国家。根据英国驻尼大使的报告,尼泊尔驻新德里大使在媒体采访中提到了尼泊尔欲发展外交关系的对象国。新德里出

版的《政治家报》(Statesman)援引其谈话称:尼泊尔不久将在中国建立大使馆。鉴于这一报道,英国驻尼大使曾询问尼泊尔政府有关尼中交换外交使团的谈判是否已经结束以及大使馆何时建立等问题。莫汉·苏姆谢尔首相回答说,与中国交换外交使团的问题尚未决定^⑧。

如果对拉纳政府 1947 年的举措进行总结的话,可以这样说,英国人的撤离令拉纳政府失去多年的依靠,印度政府不会同情拉纳专制体制,这使得它在贯彻其内政与外交政策方面将面临更多挑战。此情此景令拉纳政府急于重新审视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内战的泥潭中挣扎,对尼泊尔的建交倡议没有给予回应。后来蒋介石政府永远失去了回复的机会,因为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后败走台湾。面对英国势力撤出印度的无奈,以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中国所带来的

①三界指的是天堂、地狱、人间三界之权力。

②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 pp. 175—177.

③[尼泊尔]尼兰詹·巴塔拉伊著、刘建等译《尼泊尔与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2 页。

④From G. A. Falconer, British Minister in Nepal to Earnest Bevin, H. M.'s Principal Sec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Office, London, 13 April 1948, L/P & S/12/3048, Pol. Ext. 6153/48, No. 71, Despatch No. 18, J. O. L.; quoted in 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 p. 181.

⑤Shaphalya Amatya, *Rana Rule in Nepal*, New Delhi: Nirala Publications, 2004, pp. 24—25.

⑥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1947, in 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 p. 177.

⑦尼泊尔前外交官兼学者 B. 普拉丹(Bishwa Pradhan)教授认为,拉纳政府向美国和中国同时派出高级使团,尼美成功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 1948 年 2 月宣布互换大使,但尼泊尔访华团却因蒋介石政府陷于内乱空手而归。参见 Bishwa Pradhan, *Behaviour of Nepalese Foreign Policy*, Kathmandu: Ratna Book Distributors, 1996, p. 130.

⑧From G. A. Falconer, British Minister in Nepal to Earnest Bevin, H. M.'s Principal Sec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Office, London, 13 April 1948, L/P & S/12/3048, Pol. Ext. 6153/48, No. 71, Despatch No. 18, J. O. L.; quoted in 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 p. 181.

的惶恐,尤其是后者被视为喜马拉雅地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因素,拉纳政府决定退回到先前的政策轨道,继续把尼泊尔塑造为其南部邻居的一个有价值的盟友。

二、印度牵制下尼泊尔对与新中国建交的谨慎等待

像先前的英帝国一样,1947年取得独立的印度在喜马拉雅诸邻国奉行向前防御政策。印度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尼赫鲁与南亚诸邻国尤其是尼泊尔构建了著名的“特殊关系”,将对方纳入其防御体系之中,甚至形成了类似于“门罗主义”的尼赫鲁式的南亚战略,意在避免其他国家染指南亚^①。这一政策遏制了拉纳政权与中国进一步修好的意图。此后,在尼泊尔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尼泊尔大会党在印度的支持与庇护下推翻了拉纳独裁政权,这就决定了大会党执政后在对外政策上将不得受制于印度,并与新中国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新中国建立后,尼中关系难以用通常的方式开启。在尼泊尔看来,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莫汉·苏姆谢尔首相清楚地知道,拉纳独裁体制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制度冰火不容,从而对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新中国存在天然的恐惧。此外,他还非常害怕中国会重提与尼泊尔的历史关系问题。像国民党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申明了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但是,与此前不同的是,新中国可以把宣言变成直接行动。1950年1月1日中国公开声明要“解放西藏”,同年10月10日就付诸了行动。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让拉纳政权感到隐忧的不安,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声明和行动则令尼泊尔和印度都倍感惶恐。尼泊尔唯恐自己进入了中国扩张主义政策的视野之中,印度则担心他们一向视为安全边界的喜马拉雅天然屏障可能不保。

当中国接管西藏的意图刚一公开,印度与尼泊尔便立即进行双边协商,探讨应对之策。当毛泽东1950年1月在苏联结束了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谈即将返回北京之际,尼泊尔首相莫汉·苏姆谢尔已经到达了新德里。他访问印度的成果是当年7月31日与印度签署了《和平与友好条约》(Th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②。这份《和平与友好条约》在尼泊尔被广泛地视为一种印度令尼泊尔从属于其边界并与中国竞争战略利益的手段^③。

英属印度曾将尼泊尔视为与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缓冲国”,并把尼泊尔纳入其安全势力范围。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国的殖民遗产。1950年,尼赫鲁总理在议会发言时说“尼泊尔从地理上讲几乎是印度的一部分,尽管她是一个独立国家”,并指出这个喜马拉雅王国是“印度恒河平原的一个自然延伸”^④。这一说法明显暗示了如下事实,即尼泊尔在地理上与印度相连,从而成

为其防御半径的延伸。

拉纳政权在经受了本国民革革命的冲击后,于1951年2月垮台。在印度的规划之下,尼泊尔大会党与拉纳集团组建了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时期,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再度被谈起。不过,内部的动荡与印度的介入使该问题的进程不断延迟。

1950年后,中国对西藏领土恢复了有效管辖。对于尼泊尔来说,她已经与一个庞大而强盛的中国紧紧相邻,与中国发展关系是不可避免的。非常有趣的是,尽管尼泊尔和中国尚未建交,双方却不得不在西藏打交道,因为尼泊尔在西藏的地位比较特殊。它自1856年尼藏战争结束起就在拉萨设有代表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享有种种特权^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在尼泊尔商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据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因为害怕而放弃了长期经营的生意,逃离了西藏。然而,新中国热切地希望尼泊尔商人继续留在原地经商,甚至以贷款和预付款的方式给予鼓励^⑥。此时,尼泊尔政府期待着印

^①M. D. Dharamdasani, *Dynamics of Indo - Nepal Relations from Nehru Doctrine to Gujral Doctrine*, M. D. Dharamdasani, ed., *Nepal'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5 pp. 30—31.

^②该条约以和平友好的名义将尼泊尔的安全甚至外交纳入印度保护的范围内,因而受到尼泊尔精英的频频诟病,但至今仍未废除。有关该条约签订的背景及后果请参见拙作《试析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评1950年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学海》2009年第5期。

^③Shiv Kumar & D. Parulekar, *Nepal: Between the Dove and the Dragon*, in M. D. Dharamdasani, ed., *Nepal's Foreign Policy* p. 51.

^④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Jawaharal Nehru in Parliament, March 17, 1950, in Avtar Singh Bhasin, ed., *Nepal'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Documents 1947—1992*, Volume 1, Delhi: SIBA EXIM Pvt. Ltd., 1997 p. 37.

^⑤1856年发生了尼泊尔入侵西藏的战争,由于尼泊尔当时是中国的朝贡国,所以,在驻藏大臣赫特赫主持下签订了《西藏廓尔喀条约》。该条约使尼泊尔享有许多特权,如西藏每年赔偿尼币一万卢比;尼泊尔人可在西藏自由经商且不纳税;尼泊尔在西藏可设置官员作为代表并享受特权和拥有卫队;尼泊尔商人犯罪由尼方官员处理,西藏官员不得过问;尼泊尔人和藏人之间发生纠纷,由尼泊尔官员参加会审等等。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21页。

^⑥Vijay Kumar Manandha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 - 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 D.*, Volume II pp. 186—187.

度对尼中建交问题给予指导并提出建议,但是,在就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喜马拉雅山国等问题与中国达成谅解之前,印度不赞同尼泊尔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任何积极行动。

我们知道,尼印特殊关系显示的是印度的大国情结,所以,1950年的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被尼泊尔一些精英视为不平等条约,尼泊尔国内的反印情绪不断增长。中国作为喜马拉雅地区的主要政治参与者恰恰出现在该区域的权力均势发生变化之际,不可避免地对尼泊尔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自1951年下半年,尼泊尔许多政界要人已开始提出如下要求:作为尼泊尔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应该适时建立^①。当尼泊尔大会党通过了尼泊尔理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议并告知印度时,尼赫鲁总理冷淡地回应说“友好条约总是好的。(对此)我方不可能有任何特别反应。”^②印度的不满溢于言表,尼泊尔方面只能暂时将上述念头搁置一旁。

我国前外交官兼学者杨公素是当时诸多外交事件的亲历者,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尼双方都有建立双边外交关系的表示,但那时印度控制了尼泊尔,它不愿看到尼泊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③。尼赫鲁在1950年12月6日的议会发言中指出:自英国人统治时期始,我们就是其诸多优良及不良遗产的继承者,我们向尼泊尔保证,我们不但尊重尼泊尔的独立,而且想看到尼泊尔的不断进步和强大。在这方面我们比英政府走得更远,也就是说,尼泊尔开始(被允许)与别国发展外交关系。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不喜欢,也不打算喜欢任何对尼泊尔的外来干涉。我们承认尼泊尔是独立国家,希望它好。但是,连一个孩子都知道,不通过印度,是不可能到达尼泊尔的。所以,任何国家务必且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现实并领会其含义^④。尼赫鲁讲话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印度原则上不反对尼泊尔发展与他国的外交关系,但任何国家都必须考虑到印度在其中的特殊地位。

1951年5月21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西藏武装活动的结束,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经谈判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11月,上述协议生效,新中国恢复了对西藏的主权,西藏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就在当年8月,中国曾向尼泊尔提出过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9月,周恩来总理向尼赫鲁总理提出召开中印尼三方会议以讨论西藏问题的建议,但该会议因印度不满而搁浅。令人吃惊的是,尼泊尔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提议,直到1959年,在尼泊尔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四年之后,尼赫鲁总理才在印度议会透露了这一信息。当年11月25日,他在印度下院发言称,周恩来在与印度大使非正式会谈中

曾说过“印度边疆的稳定问题是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拥有共同利益的事情,最好由三国共同探讨。”^⑤印度对尼泊尔隐瞒上述消息,显然是因为尼赫鲁要把对尼印双方均利益攸关的事情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希望单独与中国商讨有关西藏的问题,并视其谈判结果来决定尼中关系的发展进程。所以,它对尼泊尔50年代初萌生的与中国建交的倡议肯定不会热心。

在西藏和平解放之际,尼泊尔大会党政府取代了尼泊尔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由大会党领袖之一的M. P. 柯伊拉腊(M. P. Koirala)担任首相。由于还没有清晰的印度政策作为指导,以尼印“特殊关系”为其外交政策根本的尼泊尔新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就不可能拥有独立的立场,所以,执政伊始的柯伊拉腊政府继续保持对西藏的传统政策。恰如美国的尼泊尔问题专家雷欧·E. 罗斯(Leo E. Rose)所分析的:印度警告性地建议尼泊尔不要草率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可能是加德满都在1951—1954年间故意对这一问题显得冷淡的主要原因^⑥。

三、中印协定达成后尼中建交的实现

在20世纪50年代尼印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当中,西藏问题被尼泊尔和印度两国视为利益攸关的大问题,而且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只有将其妥善解决,中印尼三方关系才会彻底理顺。而该问题解决的关键取决于中印谈判的结果。中印之间一旦达成一致,就意味着给三方关系定了基调,中尼之间的谈判才有可能启动。

如前所述,西藏问题是中尼恢复邦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自己在1856年条约中享有的在西藏的种种权利,尼泊尔方面高度重视,渴望尽可能多地保留这些权利。1952年初,当获悉尼泊尔与西藏的关系不会立即进行实质性调整的消息时,尼泊尔政府感到非常欣慰。当年3月7日,达赖喇嘛的一个特使带着1万卢比的年贡到达加德

①⑥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03.

②S. D. Muni, *Foreign Policy of Nepal*, Delhi: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73, p. 83.

③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21页。

④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 in Parliament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Relation Thereto, New Delhi, December 6, 1950, Avtar Singh Bhasin, ed., *Nepal'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 Documents 1947—1992*, Volume 1, p. 44.

⑤Narendra Goyal, *Political History of Himalayan States*, New Delhi: Cambridge Book and Stationary Stores, 1966, p. 29.

满都。像往年一样,随行者还有一大群为西藏当局购置各种给养物品的藏人。14日,尼泊尔驻拉萨商务代表收到了寄自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非常希望我们双边政府间持续的古老关系不受阻碍。我祈求佛菩萨,保佑我们的关系将比以往更牢固。”据报道,尼泊尔政府为此大受鼓舞,甚至考虑过把尼泊尔驻拉萨的商务代表处提升至大使馆的可能性^①。显然,尼方很可能错误地认为达赖喇嘛的个人信函也反映了中国的观点。

此时,尼印两国对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的立场开始发生微妙的分歧。

印度一开始对西藏的和平解放视若无睹,在公开和正式的文件中仍把西藏称为“国家”,并多次试图坚持在西藏的特权,但在屡次遭到中国的抵制后,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外交顾问、印度驻华大使 K. M. 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明智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将西藏看作我们在其中有着特殊政治利益地区的(我们理应继承的)这种英国政策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②新德里审时度势后正式终结了与达赖喇嘛势力的直接关系。1952年9月15日,印度就此在北京与中国政府会谈后,便含蓄地承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答应把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转变成总领事馆^③。1953年8月中国外交部与印度外交部商定,将印度驻拉萨的代表改为总领事^④。但尼泊尔的反应却慢了半拍,直到1954年4月5日,尼泊尔首相 M. P. 柯伊拉腊仍然委婉地将尼藏关系描述为“不受中国控制”的关系。这一点至少看起来是对中国在西藏主权的质疑,因为在1953年,中国政府就已经指示达赖喇嘛取消对尼泊尔的年贡,尼泊尔驻拉萨的商务代表处也得到通知:有关其审理驻藏尼泊尔人的诉讼案件的权利不再得到承认^⑤。换言之,尼藏条约的内容到1953年实际上已经被废止,只是尚未由外交程序和法律文件予以正式认定。

印度政府至少在1951年便已同意,有必要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印藏关系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不过直到1953年12月31日,才在北京启动讨论该问题的程序。经过4个月漫长而艰辛的谈判,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了一项有关规范印度与西藏地区通商、香客交通以及确定中印两国政府在对方领土上允许建立的商务处的数量及位置的协定。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交通和通商协定》。该协定的前言还包括第一次披露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此,印度正式承认了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充分主权。

中印协定的签署对尼泊尔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尼印当时关系而言,一旦印度正式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尼泊尔在西藏的权利就等于被贴上了封

条^⑥。尼泊尔对相同立场的表达就不可能过久拖延^⑦。早在1924年查尔斯·贝尔爵士即在其著作中预言,一旦中国改变了西藏的现状,而印度又放弃西藏时,尼泊尔将会倾向于向中国靠拢^⑧。在中印协定签字两天之后,即1954年5月1日,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King Tribuvan)及其外交部长 D. R. 莱格米(D. R. Regmi)就飞往新德里与印度政府进行磋商。在一系列会谈中,印度劝告尼泊尔应将尼藏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并使之从总体上与中印协定的精神相一致。而就在几个星期前, M. P. 柯伊拉腊首相还宣布,他的政府不打算放弃尼泊尔在1856年条约下在西藏享有的权利。现在, D. R. 莱格米只能改变口气。5月8号,他在新德里对记者说“如果中国正式与我们交涉,我们将在正确的时刻做正确的事情。”^⑨用这位外长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尼泊尔的外交政策“与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⑩。

至此,尼泊尔应追随印度改变以往维护旧条约的态度似乎已没有疑问,但是,对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还是仅仅废除与西藏的条约,尼泊尔方面一开始似乎还一头雾水,因为迟至1954年9月5日, D. R. 莱格米仍否认报界有关 M. P. 柯伊拉腊政府正在考虑与新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报道^⑪。但三个星期后,当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中国已准备与尼泊尔交换外交

^①Hindustan Times, May 2, 1952, 5: 3, quoted in 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p. 204.

^②K. M. 潘尼迦《在两个中国》,第102页,转引自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③⑤}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p. 204; pp. 203—204.

^④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198页。

^⑥T. R. Ghoble, *China - Nepal Relations and India*, New Delhi: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86, p. 41.

^⑦Leo E. Rose and Margaret W. Fisher, *The Politics of Nepal: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An Asian Monarch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53.

^⑧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 241, quoted in Hemen Ray, *China's Strategy in Nepal*,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 10.

^⑨Hindustan Times, May 8, 1954, 1: 4, quoted in 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p. 205.; Hemen Ray, *China's Strategy in Nepal*, p. 10.

^⑩Hemen Ray, *China's Strategy in Nepal*, p. 10.

^⑪The Statesman, September 8, 1954, quoted in T. R. Ghoble, *China - Nepal Relations and India*, p. 41.

代表的声明后,他立即表示欢迎。

尼中建交之路似乎已毫无阻碍,然而,就在此节点上,尼中建交问题又被耽搁下来,因为尼赫鲁总理将于 1954 年 10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要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尼中关系问题。

在尼赫鲁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对方就中尼建交事宜交换看法。尼赫鲁提出的条件是:中国不派大使驻尼泊尔,不在加德满都设立大使馆,理由是如果中国在尼泊尔设立使馆,美国也要设立^①。回国后不久,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赫鲁强烈暗示了中国承认尼泊尔是印度独有的势力范围的信息。有学者据此认为,尼赫鲁同意尼泊尔与中国建交,换取了中国尊重印尼特殊关系的承诺^②。曾经见证了中印与中尼谈判过程的杨公素在回忆录中说,印度所报导的中国已承认印度在尼泊尔的特殊地位的消息并非事实。但中尼建交后,中国派往尼泊尔的大使由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兼任,而且在加德满都设有中国大使馆,这确实说明当时中国开展对尼泊尔的关系还是要照顾印度的意见^③。

正因为如此,在访华结束后,当尼赫鲁被问及关于尼中外交关系问题时,他似乎非常大度地说:“那无疑是尼泊尔政府会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的事情。”^④显然,尼赫鲁在确保尼中建交及其关系模式与中印协定一致后已放下了所有的忧虑。他这种默许尼中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态度为尼泊尔就建交问题与中国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开了绿灯。而 1955 年 4 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则为尼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亚非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政策也是中尼关系焕发生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同年 5 月,尼泊尔向中国表达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M. P. 柯伊拉腊发表声明称,尼泊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真正的政府”,他的政府“正在考虑与北京政府建立直接外交关系”。尼泊尔外长声称,如果中国“正式地”与尼泊尔“接触”,那么这将是“恰逢其时的正确举措”^⑤。既然发展与邻近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那么中尼建交就是顺应时势之举。为了落实这项政策,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于 1955 年 7 月下旬率代表团抵达加德满都,与对方商讨正式建交事宜。7 月 26—30 日,经过四轮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内容如下:(1) 中尼驻印大使分别兼任驻尼和驻华大使;(2) 两国政府建交后,将尽快签订友好条约,谈判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商定;(3)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将于双方政府商谈友好条约时加以讨论,在此以前,所有在中国西藏地方现存之尼泊尔政府机构均将暂如现状^⑥。8 月 1 日,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并发表了建交联合

公报,两国外交关系因此正式建立。

纵观尼泊尔与中国建交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印度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尼泊尔的拉纳政府萌生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念头源于印度独立的刺激,可惜该想法生不逢时。当新中国崛起后,尼泊尔的拉纳政权和之后的政党政权均因受制于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所界定的特殊关系,在外交上成为仰人鼻息的角色。所以,无论执政党或在野党提出与中国建交的倡议均受到印度的压制,尼中建交时间被一再延迟。这一过程揭示了印度独立后欲将整个南亚次大陆纳入其安全防御体系的设想,体现了其虽曾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受害者,却又继承帝国主义余孽且妄图构建大印度迷梦的心态。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奉行的是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战略,以便打破西方世界的封锁,避免外交上的孤立。在这种战略背景下,中国遂采取了立场上的原则性与实践中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策略,适度照顾了印度在尼泊尔的特殊利益,最终实现了与尼泊尔邦交的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一大胜利。

[本文为苏州科技大学科研项目“20 世纪 50 年代尼泊尔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研究”(341410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艳芬(1967—),女,黑龙江铁力人,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这让人想起 20 世纪 30 年代尼泊尔希望在英国建立使馆时英国的相同反应和要求。英印当局作为尼泊尔实际保护者的角色不希望它在伦敦建立使馆,旨在避免尼泊尔与别的国家接触,从而打破其对南亚的垄断性影响。印度忠实地继承了英帝国的遗产,由此可见一斑。

^②*Times of India*, November 14, 1954, quoted in Hemen Ray, *China's Strategy in Nepal*, p. 11.

^③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 222 页。

^④*The Statesman*, October 16, 1954, quoted in Hemen Ray, *China's Strategy in Nepal*, p. 11.

^⑤Narayan Khadka, *Foreign Aid and Foreign Policy: Major Powers and Nepal*,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97, p. 249.

^⑥《中尼双方代表团最后达成协议的换文稿》,1955 年 8 月 1 日,引自廉正保、王景堂、黄涛鹏主编《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37 页。